

国家民委古籍保护中心重点项目
中央民族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
国家珍贵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名录整理研究丛书

GUOJIA MINWEIGUJI BAOHUZHONGXINZHONG DIANXIANG MU
ZHONGYANG MINZU DAXUE 211 GONGCHENG SANQI JIANSHE XIANG MU
GUOJIA ZHENGUI SHAOSHUMINZU WENZI GUJIMINGLU ZHENG LI YANJIU CONG SHU

主编◎黄建明

彝文经籍《指路经》研究

YIWENJINGJI ZHILUJING YANJIU

黄建明 著

民族出版社



彝文经籍《指路经》研究

YIWENJINGJI ZHILUJING YANJIU

黄建明 著



淮阴师院图书馆 1482541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彝文经籍《指路经》研究/黄建明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2012. 2

(国家珍贵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名录整理研究丛书/
黄建明主编)

ISBN 978 - 7 - 105 - 12064 - 2

I. ①彝… II. ①黄… III. ①彝族—祭文—研究—中国
IV. ①K892. 3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9925 号

彝文经籍《指路经》研究

著 者：黄建明

策划编辑：欧光明

责任编辑：张宏宏 李燕妮

封面设计：晓玉工作室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电 话：010 - 64228001 (编辑室)

010 - 64224782 (发行部)

网 址：<http://www.mzebs.com>

印 刷：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64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字 数：558 千字

印 张：37.5

定 价：160.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2064 - 2/K · 2103 (汉 1175)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黃建明 男，彝族，1954年2月出生于云南省石林县。1971年参加工作。1984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民语系彝族历史文献专业并留校任教至今。现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与资料信息中心主任、国家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少数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等职务。讲授《中国民族古文字学概论》、《中国少数民族古籍志》等课程。出版《彝文文学》、《阿诗玛论析》等五部专著以及《中国民族古籍研究60年》等十余部合著，发表《民族古文献描写方法》等数十篇论文。曾主持“中华字库·彝文字集”等多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

1482541

《国家珍贵少数民族文字古籍 名录整理研究丛书》 总序

黄建明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生共存、相互交融的整体，灿烂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在久远的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出来的，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具特色、自成一体，形成了各自的传统。正是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铸造了中华文化多样性与共同性相统一的特质以及博大精深的内涵，赋予了中华文化数千年绵延不绝、广为接纳、与时俱进的强大生命力，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壮大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与进步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当前，世界一体化趋势扑面而来，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相互交融日趋强化，这将有力地推动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但是，世界一体化并非世界趋同化，更非文化单一化。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不仅需要物种多样性，而且也需要文化多样性。在世界一体化面前，古老的中华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我们既要从一切外来文化中汲取养分，又要十分尊重、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对于由于种种原因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更要给予特别关注，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和保存、弘扬和发展。

党中央就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了专门决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成为重要国策。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伟大事业中，我国少数民族古籍担负着重要而特殊的历史使命。我国少数民族古籍中，既有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记录，也有各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描绘，还有各民族历史交往的史实，其积淀丰富、深厚，是古代民族向现代民族传递的重要信息，更是中华民族文化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少数民族古籍是我们今天推动各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基础之一，在中华民族文化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是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也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例如，少数民族古籍文种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世界几个大的文字体系，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字中都已涉及。目前发现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有阿拉美字母体系方面的佉卢文、突厥文、粟特文、回鹘文、蒙古文、满文、锡伯文等古籍；婆罗米字母体系方面的龟兹文、藏文、于阗文、八思巴文、傣文等古籍；阿拉伯字母体系方面的察合台文、小经文等古籍；拉丁字母体系方面的柏格理苗文、傈僳文、景颇文等古籍；汉字体系方面的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朝鲜文、壮文、侗文、布依文、京文、水书、女书等古籍。我国还有自源文字体系的彝文古籍、纳西东巴文古籍、尔苏沙巴文古籍等。无论从文种数量还是藏书数量而言，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无法与之比拟的。因此，保护中国少数民族古籍多样性，是当代中华民族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所应担当的责任和义务。

我国把古籍保护工作纳入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已先后制定了多项保护政策，采取了多项保护措施。近几年，由国家实施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选制度，是历史上最有创意、最有力度、最有成效的重大保护举措之一。在全国行业范围内，从浩如烟海的各民族古文献中逐一地筛选出珍贵古籍，然后层层上报、层层比较、层层筛选，最后入选国家级珍贵古籍名录，从国家层面对这些古籍进行重点保护。

在“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选中，少数民族古籍不仅以文化平等的身份参选，而且受到特别重视。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认同，其意义远远超出评审本身，给各民族带来的感受是民族大家庭的温暖，这将大大激励少数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推动和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共同发展。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是通过层层评选推选出的文化精华，内容和形式都堪称上品，入选的少数民族古籍也不例外。“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筛选大力地推动了少数民族古籍的保护工作。不过，保护与发掘少数民族古籍，比保护汉文古籍任务更为艰巨，工作环节更为繁杂。首先，汉文古籍已形成了一种传统的保护机制与体系，目前汉文古籍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完善。而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仍处于初级阶段，保护工作得从头做起。其次，少数民族文字普及程度普遍偏低，一些民族古文字著作更是仅有少数专家能识读，面临着濒危的威胁，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任重道远。

评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固然重要，整理、研究“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也同样重要。评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保护古籍，把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生整

理出来，古为今用，为子孙后代造福。《国家珍贵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名录整理研究丛书》，是整理、研究“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新尝试，旨在通过我们的行为，引起社会各界对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的进一步重视；通过发掘与整理，让中国少数民族古籍在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通过研究与推广，让“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这朵奇葩，开得更加绚丽多彩。

2012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一节 《指路经》概述	/1
第二节 《指路经》是以彝族迁徙史为依据的典籍	/10
第三节 《指路经》是以万物有灵、灵魂不灭 观念为依托的典籍	/18
第四节 《指路经》是以祖先崇拜观念为 支撑的典籍	/27
第二章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指路经》译注、整理与解读	/41
第一节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指路经》概述	/41
第二节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指路经》原件影印	/45
第三节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指路经》译注	/68
第四节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指路经》整理与解读	/198
第三章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指路经》研究	/245
第一节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指路经》的地名考释	/245
第二节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指路经》迁徙路线考	/279
第三节 从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指路经》 看彝族的生死观	/287
第四节 从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指路经》 看彝族宗教信仰的转型	/300

第四章 同为东南部方言区的彝文《指路经》与“国珍本”

《指路经》的比较研究	/309
第一节 东南部方言区彝文古籍概述	/309
第二节 西部撒尼彝文《指路经》与“国珍本”	
《指路经》的比较研究	/315
第三节 北部撒尼彝文《指路经》与“国珍本”	
《指路经》的比较研究	/363
第四节 弥勒阿哲支系彝文《指路经》与“国珍本”	
《指路经》的比较研究	/385

第五章 南部方言区的彝文《指路经》与“国珍本”

《指路经》的比较研究	/400
第一节 南部方言区彝文古籍概述	/400
第二节 元阳彝文《指路经》与“国珍本”	
《指路经》的比较研究	/405
第三节 新平彝文《指路经》与“国珍本”	
《指路经》的比较研究	/427
第四节 双柏彝文《指路经》与“国珍本”	
《指路经》的比较研究	/442

第六章 东部方言区的彝文《指路经》与“国珍本”

《指路经》的比较研究	/467
第一节 东部方言区彝文古籍概述	/467
第二节 禄劝彝文《指路经》与“国珍本”	
《指路经》的比较研究	/473
第三节 威宁彝文《指路经》与“国珍本”	
《指路经》的比较研究	/489
第四节 大方彝文《指路经》与“国珍本”	
《指路经》的比较研究	/508

第七章 北部方言区的彝文《指路经》与“国珍本”	
《指路经》的比较研究	/527
第一节 北部方言区彝文古籍概述	/527
第二节 美姑彝文《指路经》与“国珍本”	
《指路经》的比较研究	/532
第三节 普格彝文《指路经》与“国珍本”	
《指路经》的比较研究	/550
第四节 盐边彝文《指路经》与“国珍本”	
《指路经》的比较研究	/568
附录一：《指路经》地名索引	/579
附录二：《指路经》中在石林县境内的迁徙路线示意图	/589
后 记	/590

第一章 导 论

彝文古籍是彝族古老文化的历史记忆，是彝族文明的重要载体，是分布在西南各地彝族历史与文化一脉相承的有力见证。在众多的彝文古籍中，《指路经》又承载着更多的彝族古代历史文化信息，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其他古籍不可代替的作用。因而，彝文古籍《指路经》于2007年被文化部列入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指路经》以彝族迁徙史、思想史、文化史为根据，经过历代彝族人民用心灵和智慧精心培育，并代代补充修改与相传，才铸就了《指路经》古而不朽的篇章。

第一节 《指路经》概述

千百年来，《指路经》生生不息地流传在广袤的彝区大地，深深扎根于彝族社会。在当今五彩缤纷的彝族符号中，《指路经》是彝族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之一。

彝族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省（区），自称“诺苏”、“纳苏”、“聂苏”、“尼”等，他称有“诺苏泼”、“黑彝”、“撒尼”等。汉文史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彝族的称法不尽相同。如历史上曾称彝族为“夷”、“罗罗”、“倮倮”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称为彝族。彝民族是一个支系繁多的民族，不同支系之间生活习惯、服饰、丧葬习俗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尽管彝族分布在不同的省区，自称、他称、支系、服饰等有着许多的不同，但在葬礼上念诵的《指

路经》内容都基本相同。

各地彝族社会发展进程极不平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哀牢山区的彝族山苏支系社会生活中还残存着明显的原始社会痕迹，大小凉山实行的是奴隶社会制度，乌蒙山部分彝族地区则早已进入了封建社会，云南个旧彝族地区还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六十多年前，具有人类社会发展形态标本意义的彝族社会，在不平衡的社会形态中共同保持了在葬礼上由毕摩念诵《指路经》的形式。毕摩是彝族的祭师，在彝族传统文化的保存与传承方面有较大的贡献。

凉山奴隶社会制是以家支制度维护等级制度的一种社会。以家支为单位，以血缘为标志，把社会群体的人分为数百个家支。不同的家支又分为若干个社会等级。不同等级之间是剥夺与被剥夺、占有与被占有、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但在不同的家支、不同的等级、不平等的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中，在葬礼上念诵的《指路经》却是平等的，不同等级的人共同享用着同一种《指路经》。

各地彝族居住在不同的等高线，居住在高海拔的高寒山区彝民以种植土豆、荞麦和养殖畜牧业为生；居住在半山区的彝族人为典型的山地民族，以种植玉米为主；居住在高原盆地的彝族人则以种植水稻为主。无论居住在高寒山区、山区半山区、坝区（西南官话称盆地为坝区）的彝族，尽管居住在不同的纬度、不同的海拔等高线而形成不同的生活习俗，但共同保持着在葬礼上念诵《指路经》的古老传统。

彝族有自己的语言，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彝语分为东部方言、东南部方言、南部方言、西部方言、北部方言、中部方言。在彝语的六大方言区中，不同方言的话语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不同方言间的彝语，基本听不懂其他方言的话。但不同方言之间都共同保留着《指路经》，且各地《指路经》的语言风格和修辞形式等都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

彝族有自己的文字，彝语称这种文字为“司”或“波玛”。汉文史料中称“夷字”、“爨文”、“韪书”、“蝌蚪文”、“倮倮文”等，随着族称的规范，现统称为“彝文”。大部分彝族地区都保留有彝文，但部分彝族地区彝文已失传。在彝语六大方言区中，现保留彝文的有

东部方言、东南部方言、南部方言、北部方言四大方言区，西部方言和中部方言两大方言区已失传彝文。随着语言的变化、方言的形成，各方言间的彝文也产生了一定差异，不同方言区的彝族，基本上看不懂其他方言区的彝文，但不同方言之间的彝文文献却共同保留着《指路经》，且书面语都为五言句。即使是失传了彝文、没有了文本的西部方言和中部方言区，在葬礼上仍然通过口传的形式念诵《指路经》。

彝族的宗教信仰是以祖先崇拜为核心，以万物有灵为特征的原始宗教，其祭师为毕摩。不同彝族地区的原始宗教仪式、项目、内容、形式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在不同的宗教仪式中，却共同保留了念诵《指路经》过程中的相同仪式。

如上所述，彝族分布在不同的地区，存在着支系现象、家支制度和等级制度等情况，语言、文字、服饰、生产、生活习俗等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指路经》的内容和形式却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指路经》中太多的相同因素，成为彝族民族认同的标志之一。不难理解，只有同一个民族才会有共同的作品，各地的《指路经》只有同种同源，才能历经沧桑仍然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彝文古籍浩如烟海。然而，流传在各地的彝文古籍，少有书名、内容、形式相同的文本。唯有《指路经》例外，书名大体相同，内容大致相近，风格基本相似。这给我们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息，即《指路经》是众多的彝文古籍中最为古老的一种，它形成于彝族先民尚未分支以前的远古时代，后来各个氏族分支后虽然各奔东西，但是仍然保持了各地彝文《指路经》的一致性。可见，《指路经》在众多的彝文古籍中属于最底层的文本，是最古老的一种彝文古籍形态。

各地彝文《指路经》虽然形态相同，但是内容却存在一定的差异。相同的形态为我们提供了《指路经》的可比性。通过对流传于不同方言区彝文《指路经》的比较与探索，可以探讨彝文及其文献方言形成的一般规律，揭示彝文古籍的源流与发展史。

《指路经》是毕摩在葬礼上为亡灵指路时念诵的一部经书。在彝族先民看来，生命由身体和灵魂两部分（即有形和无形）组成。一个人的死亡只意味着有形的身体部分生命的结束，无形的灵魂部分的生

命仍然存活。所以，必须把亡灵送到祖先发祥地，与祖先灵魂共聚，让祖先灵魂对其进行保护。毕摩在葬礼上为亡灵“指路”的那部分经书称为《指路经》。

彝族人的葬礼，须延请毕摩来为亡灵超度。其《超度经》一般要念2~3天。各地《超度经》篇目的多少、篇幅的长短不一。阿哲支系的《超度经》有40多个篇目，而撒尼支系的《超度经》只有20余个。在60余个篇目中，只有《指路经》的篇名相同。《指路经》不仅是《超度经》中唯一的一篇，而且也是整个《超度经》中最重要的一篇。《指路经》是毕摩必备之书，每一个真正的毕摩，至少拥有一部《指路经》。由此，《指路经》是众多的彝文文献中存量最多的一种。

《指路经》的作者与成书年代不详，彝族早在数千年以前就已分支并分布于今云、贵、川各地，可见《指路经》在数千年彝族分支以前就已形成，所以分支以后各地《指路经》才能保持了一致性。从彝语各方言区《指路经》篇幅长短不一、内容悬殊，甚至同一区域的不同村寨、不同流派的毕摩的《指路经》内容差异现象来看，《指路经》并非某一圣人之作，而是历代人民不断加工创作的结果。从这一点看，《指路经》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指路经》，其版本有所不同，可以说在众多的彝文文献中，《指路经》是版本最多的一种。

《指路经》为五言句，念诵时须配以带有阴森气息的曲调，多选择在深夜念诵，待天亮前一定要把《指路经》念完。类似层层规矩，使得《指路经》在《超度经》中比其他篇章多了几分神秘。

各地的彝文《指路经》从死者所在地指起，一站又一站地指向远方。据有关专家考证，《指路经》是沿着彝族先民的迁徙路线，以逆指的方式，一站又一站地指引到祖先发祥地。以宗教面目出现的《指路经》，其背后隐藏的是一部恢弘的彝族先民的迁徙史。一个个地名，反映的是彝族先民蹒跚的迁徙步履。

《指路经》不仅是彝族先民一种神圣的宗教仪式，同时又是一种庄严的“安魂”仪式。它反映的是彝族先民对生与死的理解，折射的是彝族先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彝族先民哲学思想的回光反映。

《指路经》自形成之初始，一直处在动态与变化之中。不仅文本有变化，就不同时代的人对《指路经》的认识和态度也发生着变化。古时，毕摩念诵《指路经》视为庄重的“安魂”仪式，一丝不苟，作为一种使命来完成。如今的毕摩虽然也同样念诵《指路经》，但是少了几分神圣感、庄重感和使命感，仅仅将其作为一种程序、一种仪式去对待。

由于《指路经》独到的价值与魅力，早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从目前所见的信息来看，《指路经》为学者们最早对彝文文献关注的文本之一，是目前翻译出版最多的文本，也是专题研究论文最多的文本之一。

国内外学者中最早关注《指路经》的是法国学者保禄·维亚尔，他在19世纪末写的《维亚尔的云南来信》一文中就已描写了他所见的某些现象：“一边有人在跳舞，另一边巫师（毕摩）们在祈祷。巫师坐在放满什物的桌边，眼看经书，轮流着每人吟一段为死人祈祷的经文，其开头一段总是描述天门大开和阴间审判官起立的壮丽场面。”^①保禄·维亚尔虽然未曾翻译整理《指路经》，但文中谈到的“天门打开”和“阴间审判”谈的就是《指路经》中的部分情节，说明《指路经》曾引起保禄·维亚尔的关注与兴趣。

国内学者中最早翻译、整理《指路经》的是丁文江先生。20世纪30年代，彝族学者罗文笔和地质学家丁文江共同翻译了贵州大方县的彝文《指路经》。此译文后来收入丁文江编撰的《彝文丛刻》一书中，此书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彝文丛刻》共收《千岁衢碑记》、《说文（宇宙源流）》、《帝王世纪（人类历史）》、《献酒经》、《解冤经》（上下两卷）、《天路指明》、《权神经》、《夷人做道场用经》、《玄通大书》、《武定罗婺夷占吉凶书》11种经典文献。其中《天路指明》为《指路经》的同名异写。

彝学专家马学良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在云南彝族地区调查彝文

^① [法] 保禄·维亚尔著，黄建明、燕汉生编译：《保禄·维亚尔文集：百年前的云南彝族》，96页，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

及其文献时，当时涉及的只是《超度经》中的《作祭献药供牲经》等，没有对《指路经》作专门的翻译与研究。不过，在1986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彝文丛刻（修订本）》中把所译的《指路经》收录了进去，此彝文抄本为贵州大方的古籍，由罗国义、马学良合译。

20世纪80年代初，彝族学者罗希乌谷和著名毕摩金国库，合译了云南省石林县^①海宜村彝文抄本《指路经》，其书名用音译的方式题名为《喀吉思》，汉文、撒尼彝文、凉山规范彝文对照。《喀吉思》于1983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

20世纪80年代中期，黄建明、梁红合译了石林县上新宅村的《超度经》，用彝、汉文对照的形式于1991年12月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题名为《尼布木司》的上新宅村《超度经》，收录了《天地崩溃篇》、《驱邪篇》、《姓氏篇》、《钱财篇》、《帽子篇》、《叉篇》、《养蚕织布篇》、《开路篇》、《指路篇》等。其中的《指路篇》即《指路经》。

1983年，中央民族大学彝族历史文献大专班翻译了一套“指路经丛书”，此丛书译稿，后由果吉·宁哈、岭福祥主编，题名为《彝文〈指路经〉译集》，于1993年10月由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此书收录了来自云南石林、双柏、红河、弥勒、禄劝、武定、中甸、宁南、罗平，四川普格、甘洛、喜德、盐边、美姑，贵州大方、威宁、盘县、赫章等18篇《指路经》。

1996年6月，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师有福翻译、整理的《斐妥梅妮·苏嫫》，其中以彝、汉文对照的形式收录了阿哲支系的彝文《指路经》一篇。

1997年3月，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由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译的《彝族指路丛书》，该书收录了毕节县三官村、毕节县洛烘乡、大方县、纳雍县、赫章县、威宁彝族苗族回族自治县龙街镇、威宁县长坪村7个点的7篇彝文《指路经》。

1999年12月，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由玉溪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① 为了行文简洁，后文中的石林彝族自治县简称为石林县。石林县即原路南县。